

作为文化生产的“性别”：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文化批判

马 睿

摘 要: 揭示性别的社会属性, 重塑女性的主体意识是西方女性主义的两大文化诉求, 因此, 不仅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与意识的辩证论述一直是其重要理论资源,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哲学和文化生产理论两种理论模式的发展, 也都为女性主义批评所吸收。总体而言, 女性主义更倚重后者。1970 年代以来, 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受到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和英国文化研究的影响, 运用文化生产理论进一步深化对父权文化的社会性成因和物质性效果的理论探讨, 从根本上解释了为什么性别不是单纯的生物学事实或主体意识, 而是文化生产的产物, 是在历史中建构起来的一整套社会制度。尤其是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提倡的“话语政治学”, 更是试图用文化生产理论修正后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的意识哲学倾向。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 性别; 父权文化; 文化生产; 话语政治学

作者简介: 马睿,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 主要研究文艺理论、电影理论、美学、文化研究。电子邮箱: m. rui@126. com

Title: Gender as Cultural Production: The Cultural Critique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Marxist Feminism

Abstract: The uncovering of the sociality of gender and the reshaping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women are fundamental cultural appeals of feminism, and these appeals may rely on theoretical support from both classical Marxist dialectical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ety and consciousness and Western Marxist illuminations of the subjectivity and cultural materialism, although the latter may take on more weight for feminist criticism. Since 1970s, Marxist feminism has absorbed the theory of cultural production, developed on Althusser's theory of ideology and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in its analysis of patriarchy, capitalism and gender system, and gender is thus disclosed as the result of patriarchal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a social institution rather than a pure biological fact or subjective identity. Through "the politics of discourse" as developed from the theory of cultural production, contemporary materialism feminism may try to revise the philosophy of consciousness in the post-Marxist theory of discourse.

Key words: Marxist feminism; gender; patriarchal culture; cultural production; the politics of discourse

Author: Ma Rui is a professor in The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at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41, China) with research interests in literary theory, film theory, aesthetics and cultural study. Email: m. rui@126. com

一、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路径选择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是一个需要辨析的概念。作为总称, 它指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为基础进行的女性主义理论建构, 既是女性主义的主要分支之一, 也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由

于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当代都有非常活跃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也形成了多个派别, 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马克思主义女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和“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出现最早的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 立足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 - 上层建筑”理论来阐述女性问题, 为了区别于总称, 本文用“传统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来指称这一派别;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

和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发展稍晚,吸收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强调性别压迫和阶级压迫都是最基本的压迫形式,“侧重于从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结合中展开对女性受压迫地位的分析”(许春荣 5),主张用性别视角完善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唯物主义女性主义重在性别压迫的文化表现进行唯物主义的解释,并在后结构主义话语理论的影响下把对文化的意识形态批评深入到对话语的意识形态批评;此外,在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还产生了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在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发展中就呈现出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促动了女性主义理论的推进,但女性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提供的资源,也有基于自身立场的选择。进入 20 世纪,以卢卡契、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早期“西马”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强化精神性实践的维度,建构以意识哲学为基础的美学和文艺理论,主张主体意识和文学艺术等精神文化产品对物质现实和制度体系应具有超越性。然而,女性主义从一开始就把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文化传统视为长期存在的父权制社会的产物,更对已被性别化的主体持怀疑态度,其理论重点在于剖析父权制如何通过文化实施和巩固性别压迫。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最先发展起来的也是对男性经典的批判性阅读,因此,它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时,较少关注时代更接近的以意识哲学为基础的审美救赎论,而更倾向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对意识的社会学分析,更倾向于把美学、主体意识以及文学艺术看作不能与物质基础和政治经济制度剥离的社会文本。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满足于仅仅对父权制及其文化产品进行批判,更希望从正面建构“女性意识”,从思想上、精神上对女性群体进行改造。为此它吸收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哲学的理论模式,以作者意识、作品精神意蕴、读者意识的连接为前提,积极提倡具有“女性意识”的文学写作,把文学作为实现女性主义文化目标的重要途径。但是,意识哲学的理论模式在当时已被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质疑,以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批评和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为代表的当代“西马”,发展了文化生产的理论模式,视文化为社会生产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对社会生产的反映,并致力

于在一切文化产品及其形式中追索物质性和体制性的因素。正如伊格尔顿所说,“‘文化’最先表示一种完全物质的过程,然后才比喻性地反过来用于精神生活 [……] 用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文化这个词语使得基础与上层建筑在一个单一的概念之中得到了同一”(2)。这是在新的理论语境中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回归和发展,与女性主义的文化观有更多契合之处。文化生产的理论模式促进了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结合。随后,在后结构主义推动下,后马克思主义从意识形态批评中发展出话语批评,一方面沿用文化生产的理论模式,认为话语既是文化生产的结果也是其方式,但它倾向于以话语实践涵盖一切社会实践,身份认同被等同于主体对某种文化立场的认同和呈现,意识哲学的理论倾向改换了衣装再次登场。这一倾向也见于当代女性主义,朱迪斯·巴特勒 (Judith Butler) 的“性别操演性”(gender performativity) 是其典型代表,从文化生产理论的逻辑出发,性别主体的社会建构性被推向极致,先于社会表征的身体是不存在的,精神/身体的二元区分应该被质疑(巴特勒,“性别麻烦”17);但这也意味着主体的性别意识是可变的,而意识的变化可以重塑人们作为男人或女人的身份,可以重新表征身体,如此一来,又回归了意识哲学的逻辑。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也吸收了后马克思主义对话语、表征的重视,但它致力于使包括话语批评在内的文化批评回到更丰富的社会实践的领域中,维护和恢复女性主义身份政治与现实中的女性群体的关联。所以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在承认后马克思主义话语批评的洞察力和启示性的同时,也指出它“侵蚀了女性主义赖以批判父权制的根基”(Hennessy “Introduction” xv),并认为应该提倡一种与总体性社会分析相互补充的“话语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discourse)。^①

总体而言,“西马”的意识哲学理论模式和文化生产理论模式,都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文学批评和文化理论有重要影响,它们的影响不是阶段性的交替出现,而是同时存在并形成一种张力,随着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发展,文化生产的理论模式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中占据了上风。

二、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 对女性主义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女性主义的三大理论资源之一,而且相对于另两种重要理论资源精神分析学和后结构主义,它对女性主义的影响更全面,历史也更长久。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本来就有关于性别不平等问题的阐述,随着女性主义理论的兴起,这些观点必然会进入女性主义的视野。

考察女性主义理论的建构,我们可以看到经典马克思主义原理是如何在女性主义领域发挥影响的。“女性”和“性别”是女性主义理论的基本范畴,但这些概念原有的涵义是漫长的父权文化的产物,往往与女性主义的政治诉求和理论逻辑形成悖论,为此女性主义理论必须对这些范畴进行更新。女性主义最重要的理论突破在于把“女性”和“性别”还原为社会学范畴,揭示性别区分不单是一个生物学事实,而主要是一种具有政治经济目的并体现权力关系的社会建构。由此,在父权文化体系中居于弱势、负面、消极位置的所谓“女性本质”并非先天的生物学属性,而是后天的社会处境的产物,不是女性本身导致了她们作为“第二性”的次要从属地位,而是不平等的社会关系“生产”了这样的“女性”,换言之,父权文化制造出所谓的“女性本质”,却把原因归结于女性先天的生理、心理属性。区分“女性”的生物学层面和社会学层面并取消二者之间的必然联系,是对被束缚在旧有社会角色和行为模式中的女性群体的极大解放。显然,马克思从人类社会实践来理解主体的形成,把人的本质视为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女性主义的需求提供了理论基础。为从社会实践的角度重新审视“女性”作出奠基性贡献的女性主义理论家西蒙·波伏瓦,就有明确的马克思主义学术背景。黑人女性主义和后殖民女性主义兴起以后,对女性群体内部差异性的强调是女性主义理论对“女性”范畴的又一次突破,这仍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反对把人的本质抽象化、普遍化的历史唯物主义逻辑。女性主义关于“性别”的讨论,还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在经典马克思主义那里性别压迫就被表述为阶级压迫的一种形式,是一种有意识的制度性建构,因此女性解放的道路也与消灭阶

级的途径一致,都要以改变在经济关系中的地位为起点,为基础。后起的女性主义理论虽然批评这种解释忽视了性别不平等的特殊性,忽略了其中的非经济原因,但仍然认为从家庭模式、劳动分工等社会制度来分析女性处境的思路是极具启示性的,也认同性别与阶级之间存在的相关性。《性政治》的作者,激进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凯特·米利特就认为性别压迫是一切社会压迫的基础,女性群体正是因其性别而成为一个社会阶级。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更是把性别、阶级、种族等各种压迫关系视为一个相互支持的一体化权力结构,性别、种族中的所谓生物学因素都只是统治者掩盖权力关系、使压迫合法化的幌子,因此只有在深刻认识阶级的前提下才能对性别进行有效分析。

社会学意义上的性别既是一种有形的制度建构,也是无形的意识形态,正是后者使得受迫者通常被施迫者的价值观所同化,使得女性也成为父权文化的自觉维护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意识形态的洞见为女性主义解释性别压迫的秘密提供了支持。意识形态的成因最终可追溯到经济生活,但它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当大的主动性,不仅可以反过来作用于物质现实甚至是再生产物质现实,即使在经济事实已经改变的情况下,原有意识形态仍然能长期存在。这帮助女性主义解释女性经济地位、法律地位的改变何以并未消除性别压迫,并未瓦解父权文化的社会影响。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作为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并不完全是从经济生活中自发产生的,而是具有明显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性质,通过对教育、习俗、文学艺术的引导或控制,在社会中生产出一种主流的意识形态,作用于群体也作用于个人,并不断地再生产与之相应的制度。这帮助女性主义解释父权文化对性别化主体的建构,以及这种建构如何对劳动生产和家庭生活中的性别分工模式进行再生产。重视意识形态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家通常都强调性别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生产关系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并认为教育、文学、大众媒介是生产和再生产性别意识形态的重要途径(秦美珠 92-97)。由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具有强大的生产能力,它通常也被统治者所接受,因此主体的意识并不一定与他的社会身份对应,正如卢卡契所揭示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并

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是要通过主体的革命才能获得。这帮助女性主义解释为何女性常常自觉服从父权文化甚至成为它的同盟,也启发女性主义发起“提升觉悟”(consciousness-raising)的政治文化实践,有意识地进行对女性的主体改造和对社会的文化改造。

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全方位地触及了物质基础、制度事实、文化生产和主体的精神情感体验,并提出了解放的目标与设想。女性主义理论的不同派别虽然各有侧重点,但基本上都认同父权制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的综合体,并能有效适应不同经济制度,致使女性解放成为一场“最漫长的革命”,因而女性主义对父权制的研究和批判也应该是整体性、全方位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尤其重视揭示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明确主张建立一种综合性理论来解释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妇女状况,并立足于人类的全面解放来探索女性解放的道路。为此,它广泛借鉴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分工、异化、资本、交换价值的理论,赋予其性别视角,用以分析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结合如何通过劳动的性别分工和家庭意识形态来否认、剥夺女性劳动的交换价值,如何使女性在私人领域的生育和家务劳动与公共领域的社会劳动一样沦为异化劳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吸纳,不是单方面借鉴,仅仅使女性主义理论成为资本主义批判的一个构成部分,而是暴露了原有批判理论的盲点,促使当代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必须发展性别视角。

在文艺观上,马克思主义对女性主义的影响更具普遍性。马克思主义强调文学艺术隐含在美学之中的政治性,揭示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的双重性,既可能维护和固化现实秩序,也可能导向对主体和世界的改造,这些基本原则几乎为所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流派接受。相对于对文化批评的重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在文学理论的建构上着力不多,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原理和批评方法已被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普遍运用。

尽管西方女性主义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和资本主义批判缺乏性别视角,但共有的对人类历史上存在的压迫性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批判使二者的互动和结合成为必然。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实践的本质论、意识形态理论、资本主

义批判、阶级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的文艺观,以及马克思主义社会分析的方法论,不仅启发、支持了各女性主义流派对女性处境和父权制的判断,更成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基本理论构成。可见,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都非常重视吸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方法论。当然,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中,更能见出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互动,也更能见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性和开放性,它开放理论边界,立足当下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文化经验并广泛纳入其他社会批判理论的角度,正视不断变化、更趋复杂,且产生出更多内部差异性的资本主义现实。

三、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文化批评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一直以来都主张,主体意识以及一切精神文化产品的产生都难以与社会性、物质性相剥离,对性别压迫的批判既要着眼于直接的物质层面,更要揭示文化、心理层面与物质层面的相关性。但在不同的发展时期或理论分支中,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程度和分析方法是有变化的。“西马”文化生产理论模式的建构,进一步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提供了理论武器。

传统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这三个理论派别,彼此之间虽有差异和分歧,但并非各自为政,在理论上、议题上都常有交叉和重叠,有时在同一个理论家那里,派别界限也非常模糊,比如朱丽特·米切尔、米歇尔·巴雷特,都既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主要理论代表,又对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传统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兴起于20世纪60、70年代,是随第二波女权运动和新左派批评而产生的,主要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阶级压迫来探求性别不平等的根源和解决途径,更倚重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问题的理论。随后出现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则是对前者的发展和修正,主要强调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共同作用和相互支持,批评传统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忽视非经济性的压迫。^②社会主义女性主义逐渐接纳了阿尔都塞等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的整合,更重视对物质现实、主体心理构成、

话语系统的一体化的分析。英国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大本营,其代表人物如朱丽特·米切尔、迈克尔·巴雷特、科拉·卡普兰等,从不同角度讨论了性别意识形态是如何在家庭、性、生育、教育、文学等领域生产和再生产的。^③在美国,阿利森·贾格尔把马克思主义的异化概念从社会劳动领域延伸、扩展到女性生活的所有方面,把一般性的社会关系的异化具体到性别关系的异化,并以此作为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分析的概念框架;在此基础上,强调父权意识形态对从事文化生产的女性的异化及其危害性,进而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知识论,建构一种立足女性立场的解释世界的系统理论(秦美珠 150-58)。可见,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已经认识到意识形态生产与知识生产的密切关联,而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则对这一关联中的主体性和话语性问题更为敏感。

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末,最早由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克里斯汀·德尔菲(Christine Delphy)提出,很快得到英美女性主义者的响应,主要特征是借鉴阿尔都塞的理论来说明性别是一个依赖一定社会结构的意识形态生产的结果。^④但它最引人注目、最具理论意义的发展出现在20世纪80、90年代,接受了文化唯物主义和英国文化研究的影响,也接受了福柯、拉康、克里斯蒂娃、拉克劳、墨菲等人具有后现代理论背景的话语理论的影响,提出从女性主义立场分析话语的物质性,建构话语的政治学。20世纪末以来,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成为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主要理论力量。

在物质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必然要把这种统治扩展到非物质的生活领域,并借此巩固他们在物质上的统治,以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洞见为起点,文化唯物主义从两方面阐述了话语的物质性。^⑤一方面,话语的产生具有物质性,因而应从具体的话语范畴及其形成过程追索其得以产生的物质条件和相关的制度状况;另一方面,话语也能够产生具体的物质性效果,成为社会物质生活的原因,因而应分析话语如何作用于物质现实和制度体系,如何作用于特定群体或个体的实际的物质境遇和社会境遇。这是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评推进到更具意识形态隐蔽性的领域,也试图针对更广泛的文化领域建立一种普适的、规范的分析方法。威廉斯的《关键词——文化与

社会的词汇》即有意提供这样一个范本来证实“在社会史中,许多重要的词义都是由优势阶级所形塑”(“导言”18)。其实,在威廉斯之前,女性主义对“女性”等范畴的分析和质疑就实现了对词义及其形成过程、实际影响的意识形态批评,但后来在文化生产理论的影响下明确提出建立女性主义的话语政治学,才具有了理论的自觉。性别作为一种制度建构,一个社会范畴,必然要进入公共的表述系统,必然会使众多看似相去甚远的概念、词汇产生意义的相互勾连,女性主义理论一直致力于揭示其中的权力操控,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话语政治学则不仅着眼于话语与权力的关系,更强调话语、物质基础、权力三者的关系,致力于以话语范畴为对象,对性别压迫现象进行总体性社会分析。在这样的视野下,不仅性别话语的物质基础和经济驱动被揭示出来,性别话语以纯粹文化形态对经济目的的遮蔽,对性别区分之强制性的掩饰,也随之昭然若揭。

美国的罗斯玛丽·亨尼西(Rosemary Hennessy)明确从理论上提倡建立女性主义的话语政治学,英国的唐娜·兰德里(Donna Landry)和杰拉德·麦克林(Gerald MacLean)在对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系统研究中也指出,对文化和社会历史的人工产品如文本、话语、学术体制、身份政治等进行批判性阅读是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发展方向,意识形态批评不应仅限于文学领域(秦美珠 182-97)。的确,199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的话语分析实践逐渐在更广泛的学科领域展开。^⑥同时,文学批评也被整合到总体性的社会文化分析之中,尤其是研究差异性妇女的理论家,更倾向于考察文学话语和其他社会话语不可剥离的关联,如贝尔·胡克斯的黑人女性主义批评,斯皮瓦克的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等等,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塔尼·白露(Tani E. Barlow)通过对现代汉语和现代中国文学中“女性”与“妇女”这两个范畴的考察,分析了现代中国对不同现代化模式的选择是如何作用于妇女解放和两性关系的。^⑦卷入女性主义话语政治学的理论家,并不一定都属于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对文化唯物主义、文化生产理论的吸收和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的运用,实质上已使他们参与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文化批评的学术话语。

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倡导的话语政治学,消除

了性别分析中物质实践与文化生产的二元论,也消除了性别话语与非性别话语之间的绝对界限,揭示父权制社会中的一切话语都不是无性别的,因而性别区分实际上已成为整个社会权力建构的一个基础部分。可以看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在1990年代以来的发展,使话语理论成为女性主义批评的核心,成为女性主义政治实践的重要方式。但在具体批评方法上,话语理论采取的批判性阅读,实际上是对意识形态批评的沿用和发展。随着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把政治实践的重点转向文化,文学批评到20世纪70、80年代已发展成为女性主义实行意识形态批评的核心领域,文学理论也因而成为女性主义理论建构的主要力量;话语政治学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文学理论在女性主义理论中的重要地位,这意味着女性主义已经把意识形态批评的适用范围扩大到社会文化的一切人工产品,并把文学也视为一种文化生产,这是女性主义理论走向深入、走向多学科和跨文化的结果,也是“西马”文化生产理论影响女性主义的结果。

四、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话语政治学的走向与反思

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话语政治学,事实上以这样一个判断为理论前提:既有的一切文化及其话语都不是无性别的,都难以超越于父权制的控制。因而,话语批评也就成为女性主义文化批判的核心和基本方法。但是,在当前西方社会的父权制本质并未发生根本动摇的情况下,女性主义的表述也必须借助既有话语系统才能进入公共领域的情况下,女性主义文化批判如何成为可能?一些激进的女性主义理论所寻求的解决途径,可以说是意识哲学的理论模式的翻版,试图通过意识的革命瓦解现行的性别规约,而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则主要依据文化生产的理论模式,因而强调女性主义的文化批评和意识改造不应放弃对女性现实处境的改善,不能回避对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结盟的现实制度的改造。

首先是解构主义为之提供了灵感。解构主义认为语言自身的特点决定了意义并非确定和稳定,参与意指实践的主体因素和语境因素对话语更具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既能从权威话语中发

现其意识形态生产的过程,也能找出这些话语的裂隙并实现意义的颠覆。提倡解构式阅读,从权威话语内部瓦解其权威,这成为女性主义、黑人批评、少数族裔批评、后殖民批评、酷儿理论等边缘批评的共同选择。斯皮瓦克对德里达著作的英译扩大了解构主义在英语世界的影响,她的女性主义批评和“属下”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的融合,为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话语政治学提供了一个引人入胜的路径。后来兰德里和麦克林在《唯物主义女性主义》(1993年)一书中也试图指出,通过文化唯物主义、解构和新型身份政治,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可以使阶级、种族、民族、性别等非连续的运动结合起来(Landry and Maclean “Introduction” 1-18)。

如果说斯皮瓦克立足于批判西方中心话语、男性中心话语对女性主体性的剥夺,巴特勒则试图证明通过话语实践也可以实现主体的重新建构。从法国女性主义尤其是莫尼克·威蒂格(Monique Wittig)那里得到启示,巴特勒把性别区分的人为性、政治性推向极致。在她看来,性别是文化对身体的铭刻和强制,如果没有一系列符号、话语、行为规范、着装等文化仪式的反复操演,性别的区分以及异性恋的权威都是不存在的,性别化的身体也是不存在的。既然如此,对这些仪式进行有意识的戏仿,反复进行颠覆性的性别操演,就有可能瓦解原有的性别区分,使性别身份成为一种主体的自由选择。“为了使身体范畴去自然化、重新对这些范畴进行意指,我采取的策略是在一种性别行为操演的理论基础上,描述并推荐一套戏仿实践,这些戏仿实践打破身体、生理性别、社会性别与性欲等范畴,并且超越二元的框架来展现它们具有颠覆性的重新意指与增生”(巴特勒,“性别麻烦”“1990序”5),巴特勒的策略强调甚至夸大了话语实践和主体意识的物质性效果,认为它足以改变特定个体的主体身份,足以扰乱甚至瓦解现实世界中的二元化性别结构;但她对话语生产过程中的物质性却估计不足,忽视了话语实践并不是一种纯粹的主体行为,而是受到多方面物质性、社会性因素的制约,也忽视了进行话语实践的主体并不只是一个理论策略的实施者,而是社会关系中的具体个体,有着自身的以及所属群体的现实诉求。这是对话语的物质性的片面理解,割裂了生产过程和

效果过程。因而操演理论所设想的话语实践的效果，最终也是可疑的，正如罗布·卡弗（Rob Cover）在《唯物/酷儿理论》一文中所说，“表现性^⑦提供了一种身份认同产生的理论，它潜在地在政治上被使用”，它可以揭示操纵身份认同的统治性理念来源于何处，如何发挥作用，然而“这不一定防止阶级结构与生产关系被作为统治性理念”（200）。性别操演理论是话语政治学走向极端的表现，虽然极具洞察力地揭示出话语建构和身份建构本身所内含的政治性，却无视现实的政治实践仍然要以一定的利益主体为基础。对这些质疑，巴特勒也试图给予回应和解释，在后来的著作《消解性别》（2004年）中，她申明对“性别操演性”的揭示“并不是说我可以作为塑造者去重造世界”，而是“力图与这些规范保持一种批判的、转化性的关系，并以这种方式生活[……]在这里，我们把批评理解为对束缚生活的规矩的质问，以期揭示不同生活方式的可能性”（3-4）。这实际上是承认了凭借意识革命改造世界的有限性，文化表征的实践如不能与物质现实的实践结合起来，很难实现女性主义批判的预期，更毋论建构。

理论的激进反而导致现实的政治诉求的疲弱，在这方面巴特勒并非特例，倡导“女性写作”、“女性话语”的法国女性主义，以拉克劳、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以及具有文化主义倾向的后殖民批评等当代西方批评理论也存在类似偏颇。“女性”在西苏、威蒂格那里成为一种写作的风格或范式，成为一种文化立场，与现实的女性并无必然联系；拉克劳、墨菲取消了“话语”实践和“非话语”实践的区分，把政治实践简化为话语批评，在挪用“领导权”概念时背离了葛兰西的设想，走向“绝对的意志主义”（拉斯廷 164-86）；以萨义德为代表的后殖民理论，正如德里克所指出的那样，在批评西方中心主义时夸大其文化维度而忽略其经济维度，未能把握东西方关系的真正本质，因而其文化批评也难以深入和推进（72-96）。

仅仅倚重于话语理论，仅仅采取意识哲学的理论模式，女性主义对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文化批判也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为了避免“话语的陷阱”，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试图从“文化转向”回归唯物主义，重申文化是社会实践的产

物，“无论我们是把文化狭义地定义为特定社会的象征和再现，还是广义地把它理解为一个社会共有的全部生活方式，文化实践在事实上都只能是社会实践。文化被编织在日常生活的社会性结构之中，不能被看作一个独立于社会实践的存在，也不能独立于它所置身的社会关系”（Jackson 287），对于性别文化而言，巴特勒所主张的性别操演理论“不仅忽视了支撑性别区分的社会结构，因而难以说明性别区分为何以一种被普遍接受的形式存在，也忽视了日常的社会实践，因而也无助于揭示性别区分和异性恋霸权是如何在常规化的社会交往中建立起来的”（Jackson 291）。可见，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对那些具有文化主义倾向、偏离马克思主义轨道的理论有所反思，因而其话语政治学不是孤立的话语理论，而是与综合的社会分析理论和新型的身份政治理论相互补充。综合的社会分析认为影响日常生活和主体构成的，是由政治实践、经济实践、意识形态过程构成的社会总体，女性主义的文化批判即使仅以话语为对象，批评的视野和方法也应该是全方位的，社会学维度尤其不可缺少；新型的身份政治强调以身份的多重性为基础，多重性既体现于对性别主体的考量不能屏蔽阶级、种族等其他区分因素的作用，也体现于身份的建构是实际的现实处境、想象性认同和话语实践共同作用的结果。话语批评、综合的社会分析、新型的身份政治，这三方面的结合，显然使话语批评回到文化生产理论的路径上，从理论上保证了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文化批判有利于揭示话语实践在过程中和在效果上的物质性。但在具体的话语分析中，如何考察社会各种力量对某一文本、某一符号或某一仪式的生产过程，如何证实话语实践对社会和主体的日常现实的影响，对于批评者的洞察力和知识结构都是极大挑战。在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文化批评的实践中，有足够份量体现其话语政治学理论抱负的作品并不多见，这不能不说是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一个根本性不足。

20世纪末，随着全球化的日益凸显，生态问题和多元文化成为理论热点，一些新兴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派别也从其它角度对消解现实的女性主体的理论倾向提出了质疑。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文明模式对女性孕育生命的生物学功能的剥削和贬抑，主张以自然生

态与社会生态的可持续性发展为根本价值，把女性孕育生命的现实经验作为新型女性主义政治学的来源和基础；新发展主义的女性主义主张发展模式的多样性，“捍卫另类发展方式的弱势族群女性的权力和价值观”，比如它从第三世界女性的现实经验出发，在吸收后现代理论对西方中心主义话语进行消解的同时，也反对滥用后现代主义对启蒙话语的批判，因为第三世界女性还处于争取基本平等权利的阶段，还需要现代性启蒙，在这种情况下，急于批判启蒙话语是对女性解放的剥夺而不是推进（周穗明等 75-79）。这两种马克思主义女性的共同之处，在于把具体社会历史中的女性经验作为文化政治实践的立论基础，并把女性主义诉求建立在对资本主义文明模式和西方霸权的批判上。就此而言，这些新兴理论仍然坚持了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对社会历史和女性主义目标的基本判断。

如果说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是立足于对女性权益的维护而试图纠正“性别操演”这一类激进理论对现实中的女性的消解，并反对夸大女性群体内部的差异性，以挽救女性主义丧失社会基础的危机，那么在她们的马克思主义同盟者那里，则出现了对当代批判理论的一种整体性的哲学反思。伊格尔顿在其新著《文学事件》中指出，唯名论者（Nominalist）认为一切概念或范畴都是主体强加于现实事物的，抽象出来的普遍性在现实中并无对应物，因而只重视个体差异性；唯实论者（Realist）则认为普遍性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实的，也是值得探究的。在他看来，当代批判理论在唯名论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然而，“并非所有的普遍性、一般性范畴都必定是压迫性的，同样，也并非所有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在道德上都堪称完美无缺”（Eagleton 17）。夸大概念的主观性和夸大具体经验的差异性，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反对的这两种倾向，被伊格尔顿揭示出都来源于唯名论思维，而且这种思维正像它自己曾批评的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一样，也具有独断性和暴力性。伊格尔顿的批评并非突如其来，在2000年出版的《文化的观念》一书中他对“同一性文化”就有所质疑。身为“同一性文化”中的重要角色，女性主义从内部发起的反思，也自有发人深省的力量。

结 语

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理论从葛兰西、福柯、阿尔都塞、詹姆逊以及英国文化研究获取了理论灵感，以文化生产理论为话语分析的起点，又以意识哲学的逻辑放大话语实践的效果。但它对这两种理论模式的采纳，近乎一种基于实用的兼容，而缺乏理论上的深层整合。话语理论这个领域也因之充满争议。当代西方女性主义文化理论的发展，不能从这些争议中抽离出来看待，它不仅活跃地参与这些争议，倡导“话语政治学”，而且它所关注的主要对象，如性别、性、差异、身份等等，也已经成为上演这些争议的重要场所。独善其身对于女性主义来说从来就不可能。

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发展来看，女性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在不断变化，而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发展使女性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也是发展性的，它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误读，也有补充和启示。女性主义对父权文化与资本主义体制的同盟关系的揭示，就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作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它体现了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这两种理论之间的开放性关系，同时它自身也呈现出开放而多元的理论走向。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推动下，性别是一个社会文本，是一种文化生产，是一整套历史性的社会制度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

注释 [Notes]

① See Hennessy, Rosemary. *Materialist Femi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Discourse*.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② See Eisenstein, Zillah R., ed.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 See also Young, Iris Marion. "Beyond the Unhappy Marriage: A Critique of the Dual Systems Theories." *Women and Revolution: A Discussion of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Ed. Lydia Sargent.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1. 43-69.

③ See Mitchell, Juliet. "Women: the Longest Revolution." *Women's Estate*.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1. 75-122. See also Ehrenreich, Barbara. "What is Socialist Feminism?" *Monthly Review* 57.3 (2005): 70-77.

- ④See Hennessy, Rosemary, and Chrys Ingraham, eds. *Materialist Feminism: A Reader in Class, Difference and Woman's Live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7.
- ⑤“话语的物质性”(the materiality of discourse)这一概念是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达娜·克劳德(Dana L. Cloud)在1994年提出的,认为话语不仅受到社会和物质现实的影响,而且话语本身也构成社会和物质现实。这一观点可经由文化唯物主义追溯到马克思。
- ⑥See Ginsburg, Faye D., and Anna Lowenhaupt Tsing. Introduction. *Uncertain Terms: Negotiating Gender in American Culture*. By Ginsburg and Tsing. Boston: Beacon Press, 1990. 1-16.
- ⑦See Barlow, Tani, ed. *Gender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 Writing and Femin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and also see Barlow, Tani. *The Question of Women in Chinese Femin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⑧此处的“表现性”,英文原文即 performativity,国内多译为“操演性”。

引用作品 [Works Cited]

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宋素凤译。上海:三联书店 2009年。

[Butler, Judith.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Trans. Song Sufeng. Shanghai: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9.]

——:《消解性别》郭劼译。上海:三联书店 2009年。

[———. *Undoing Gender*. Trans. Guo Jie. Shanghai: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9.]

罗布·卡弗“唯物/酷儿理论:表现性,主题性,以及晚期资本主义文化中基于相似性的斗争”,《后马克思主义读本:理论批评》,张永清、马元龙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1年。193-212。

[Cover, Rob. “Material/Queer Theory: Performativity, Subjectivity, and Affinity - Based Struggles in the Culture of Late Capitalism.” *Post - Marxism Reader: Theory and Criticism*. Eds. Zhang Yongqing and Ma Yuanlong.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1. 193 - 212.]

阿里夫·德里克“中国历史与东方主义问题”,《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罗钢、刘象愚主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72-96。

[Dirlik, Arif.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Question of Orientalism.” *Postcolonial Cultural Theory*. Eds. Luo Gang and Liu Xiangyu.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1999. 72 - 96.]

Eagleton, Terry. *The Events of Literatur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伊格尔顿《文化的观念》,方杰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

[Eagleton, Terry. *The Idea of Culture*. Trans. Fang Jie.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Hennessy, Rosemary. *Materialist Femi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Discourse*.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Jackson, Stevi. “Why a Materialist Feminism is (still) Possible and Necessary?”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24. 3 (2001): 283 - 93.

Landry, Donna, and Gerald Maclean. *Materialist Feminism*. Cambridge: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3.

凯特·米利特《性政治》,宋文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年。

[Millett, Kate. *Sexual Politics*. Trans. Song Wenwei.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3.]

秦美珠《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8年。

[Qin, Meizhu. *Feminist Marxism*. Chongqing: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2008.]

迈克尔·拉斯廷“绝对的意志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的霸权概念批判”,周凡主编《后马克思主义:批判与辩护》。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164-86。

[Rustin, Michael. “Absolute Voluntarism: Critique of a Post - Marxism Concept of Hegemony.” *Post - Marxism: Criticism and Defence*. Ed. Zhou Fan.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2007. 164 - 86.]

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三联书店 2005年。

[Williams, Raymond.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Trans. Liu Jianji.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5.]

许春荣《女性与社会变革: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2年。

[Xu, Chunrong. *Women and Social Change: On Materialist Feminism*.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2012.]

周穗明等《20世纪末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北京:学习出版社 2008年。

[Zhou, Suiming, et al. *Western Neo - Marxism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 Beijing: Xuexi Publishing House, 2008.]

(责任编辑:王嘉军)